

重新認識中國： 從市面上幾部中國史論著出發的討論

韓承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知識建構和積累與人們認識世界的角度、方法密切相關。本文以 2010 到 2020 年間出版的幾部中國史論著為觀察和討論對象，描寫歷史敘述的內容和特點，進而嘗試評估這些論著所呈現的「中國」整體面貌和特質。本文挑選了兩種類型的書籍。第一，通過翻譯出版的中國通史套書，它們分別呈現了日本和美國的中國史觀點，建立了對於中國歷史經驗的長時段理解。第二，杜正勝和劉仲敬兩位學院內外的學人，展現從歷史角度理解以解構現實中國的意圖，並與公眾對話。筆者從知識史研究（history of knowledge）的「知識秩序」（order of knowledge）角度，描述和分析這幾部中國史論著，探討這兩類型書籍的論述如何挑戰或改變台灣社會舊有的知識秩序。這段過程反映了，人們企圖從這類歷史論述中尋求突破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資源。特別在 2010 年以後，兩岸衝突日漸升高、台灣主體意識增強和凝聚的趨勢中，大眾對這類資源的需求遂成為推動商業出版的知識動力，逐漸改變了台灣社會關於「中國」的認識。

關鍵詞：中國、時間、空間、中國／中華史觀、知識秩序

台灣社會學第 50 期（2025 年 12 月），頁 7-46

收稿：2025 年 2 月 3 日；接受：2025 年 7 月 10 日

* 通訊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Email: chenghuahan@ntu.edu.tw

Rediscovering China: A Study of Recent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Cheng-hua H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re closely tied to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through which people perceive the world. This article examines several historical works on China published between 2010 and 2020, describing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narratives, and evaluating the overall image and features of “China” they present. Two types of works are considered. The first consists of translated general histories of China, which respectively convey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establish a longue-duré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second includes works by Tu Cheng-sheng and Liu Zhongjing, intellectuals situated both within and beyond academia, who seek to deconstruct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the “order of knowledge” from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se works and considers how their discourses challenge or reshape Taiwan’s existing knowledge order. This process reflects an attempt to seek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rom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order to transce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Particularly after 2010, as cross-strait tensions intensified and Taiwanese identity grew stronger and more consolidated, the demand for such resources may have become a driving force behi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aiwanese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Keywords: China, time, space, China-centric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orders of knowledge

一、問題背景

人們對於「過去」的高度興趣並不同於歷史知識的發展和積累，兩者更可能像是開往不同方向的兩列火車，無法產生交集。Lynn Hunt（2018）和 John Tosh（2008）曾分別討論過這種現象，兩位史家說明了，社會大眾確實熱衷於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但培養和建構這些認知的手法與過程，是脫離史學專業的。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大眾容易以一種絕對真相的立場來建立關於「過去」的認識，並以為歷史就應該是這樣發展：我所理解的某段歷史就是絕對真實的存在，無可容他者置喙之空間。這種歷史認識可以形成特定群體賴以生存的情感、記憶和認同的資源，甚至轉化成打造政治論述和主張的憑據，進而挑起輿論爭端。在這類論辯中，雙方往往沒有交集和溝通的空間，因為彼此都認定自己所理解的歷史才是最真實與正確的。這與現代歷史學強調的，史家依據材料、觀點和立場做出有限度的推論，進而讓不同觀點的歷史解釋交織成多元論辯的過程，有極大差異。當代台灣社會因中國歷史知識所產生的爭議，確實反映這種狀況，是亟待解決的困境。

分歧的中國史知識，呈顯社會大眾關於中國的多種認識，又因為彼此認為自己認知的歷史為真，導致許多衝突，無法藉由往復論辯來逐步釐清歷史問題，推進關於中國的理解。誠然，在台灣社會裡，中國史本來就是一個深受學術與政治力量交互影響的範疇。自黨國時代尾聲伊始，我們逐漸從一元論視角的中國史脫離，但仍在過程中遭遇許多挑戰。綜觀往昔十年間，許多爭議就顯露了人們對於中國史認識的特定觀點和立場。例如，2014 至 2015 年間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案，就起因於政府欲以憲法框架來規範歷史書寫，大幅度影響台灣史課程架構與內容，讓人產生將台灣史「再中國化」的感覺，進而觸發大規模政治社會運動（吳俊瑩等 2015）。甚者，2019 年上路的 108 課綱，歷史學部分因改採專題設計和東亞史架構，引發刪減中國史和

「去中國化」的爭議（黃春木 2021）。教育明顯是晚近社會產生歷史爭議的主要場域之一，中國史之於台灣歷史教育的角色，更是核心焦點。108 課綱的紛爭延續至今，在 2024 年 6 月仍有討論。有家長反映學齡兒童不識「大禹治水」，進而質疑新課綱造成學生對中國史陌生化。這類聲音隨即引致反對意見，質疑特定中國歷史段落在台灣歷史教育裡的教學必要性和特殊意義何在。¹ 歷史教育可以塑造特定史觀，建構共同的文化與認同感，進而打造國族共同體。這類意見見諸正反方論述，不論是要壓縮、切割或是放大、聯結，中國史的範疇問題及其與台灣史的連續和非連續性，始終與台灣主體性建構的課題緊密關聯。

抑有進者，歷史會影響大眾對於「中國」作為「實體」（entity）與想像之文化範疇的認識和判斷，也就是實然與應然層面的問題。實際存在的「中國」與作為文化和價值範疇的「中國」，兩者與台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是什麼？如何劃定關聯與界線？這類問題在兩國關係越趨緊張時，越顯其尖銳和重要性。2024 年 6 月，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在自己的社群媒體提出「『中國』應為三河流域」說。² 他認為，從歷史來看，「中國」不是正式的國家名稱，僅是地理名詞，「中國」應該被正名為由黃河、長江、珠江三河文明交織共構的「三河流域」。曹氏倡議，在這個區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現代民族國家型態之前，應該以環境及地理特徵來描寫與定義，而非使用「中國」這個所指意涵不明確且具變動性的歷史名詞。在這種思考下，「我們都是中國人」這種建構在歷史與文化基礎上的論述，就無法成立。曹氏此舉是為了對抗一種一般性論點，認為「中國」概念亙古不變，由古至今，所指地理和政治範疇都是現在的「大中國」，是實然與應然疊合在一起的狀態。事實上，關於概念和實體

1 〈高中生不知大禹 = 108 課綱發威？律師：都什麼時代，還在三過家門而 blue〉（三立新聞網李鴻典，2024 年 6 月 19 日），<https://reurl.cc/NYArlq>

2 〈「中國」不是國家名稱！曹興誠：應該改為「三河流域」〉（自由時報，陳鈺馥，2024 年 6 月 24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715068>

範疇發展與演變的問題，如「中國」和「中華民族」，早已積累不少研究成果（葛兆光 2011；黃興濤 2017）。曹氏此言切中部分歷史事實，「中國」確實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和實體，我們不應該將應然的範圍去疊合實然的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曹氏此舉說明了歷史知識及論述可以作為言說者劃定國家和文化疆界的工具，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上更為如此。

「當代台灣社會的中國史認識」是一個學術知識和外環境、條件相互關涉的複雜課題。上述現象反映了，此課題與我們當前對於中國的認識和理解極為相關，十分重要。這也成為筆者研究這個問題的主要動機，本文則是探索的初步嘗試。本文討論近幾年在台灣出版的中國史論著，描寫和評估這些書文的內容，說明這些出版品呈現了何種解釋中國歷史的立場與特點，與過往的主流認識模式有何異同。這是一個知識史、知識社會學論題，至少有「學術研究、商業出版、基礎教育、社會輿論、個人和群體記憶」五個面向的經驗參與其中。本文僅採文獻評述的做法，以商業出版這塊為核心，梳理部分書籍帶來的中國史知識；目前還未能觸及出版社的商業考量和出版策略，也難探求讀者期待與反應。另外，本文未全盤回顧近幾年出版的中國史論著，而是採用不同類型個案做分析，主要是考量到，以一篇文獻評述的篇幅無法操作全面性討論，因此以具有不同程度特殊性和代表性的書籍為例。筆者期盼透過本文的分類和特點評析，未來能夠在此基礎上做田野訪查，進一步描寫這幅知識史圖景。知識建構和積累與人們認識世界的角度、方法密切相關，從知識史角度來梳理這個現象，有助於理解當前社會關於「中國」的多種說法、主張甚或是認同，源自何故。

本文選擇的書籍，是 2000 年以後問世的著作，包括中文原著與譯作；但若從台灣出版時間來劃定的話，這些著作具體反映的是 2010 到 2020 年間台灣書市的中國史著動向。這也符合上述「何謂中國」相關討論出現的時間區段。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做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 2025 年

06 月) 調查, 社會大眾的國家認同自 2010 年起出現了從「中國」到「台灣」的顯著轉向趨勢。³ 這樣的轉變開拓了部分空間, 讓人們能用不同角度來觀察與審視, 將「中國」問題化。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認知與態度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類型: 一、在政治上否定中國, 但文化上認同或感興趣; 二、雙重認同, 張開雙手擁抱中國; 三、雙重否定, 完全排拒於外。這些態度和認知影響了出版商尋找「目標讀者」(target readers), 進而做出市場區隔。筆者初步觀察這十年間的書市, 中國史仍然是相當受到注目的主題, 這類主題的書籍大致可分成: 挑戰中國/中華史觀, 推崇或擁抱中國/中華史觀, 以及仿古或懷舊, 三大類型。⁴ 本文討論與分析的對象以第一個範疇「挑戰中國/中華史觀」為主, 由此思考知識市場和資源的發展、變動與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的轉移及形成之間的可能關聯。

市面上挑戰中國史觀的書籍各式各樣, 組成複雜的知識光譜。本文為突顯光譜差異及形成對照效果, 設定了兩個特色鮮明的分類, 尋找合適書籍作為分析與討論的素材。第一種類別是從史學專業研究角度出發的成果, 選擇中國通史主題的套書, 包括日本東洋史學脈絡下的《中國·歷史的長河》(2005 / 2016-2017 譯)、《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019-2020 / 2021 譯), 以及美國漢學界《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兩冊翻譯本(2010-2013 / 2013, 2020 譯)。這幾套書都是

3 <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 2025 年 06 月)>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25 年 7 月 7 日), <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4 必須說明的是, 這僅是筆者初步做的分類, 類型的標準與區隔還未經過田野調查, 這部分在未來展開下階段研究時會著手進行。觀察 2010 至 2020 年間的出版市場, 有一個明顯趨勢是, 中國/中國史主題的書籍並未隨著兩國關係越趨緊張、國族認同明顯轉向而減少。挑戰與擁抱中國史觀的書籍持續推出, 仿古或懷舊類型的書籍更是顯著成長, 像是: 1.《如果歷史是一群喵》(15 冊)、2.《回到秦朝大冒險》(2 冊)、3.《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4.《跟著宋朝人過一天》、5.《半小時漫畫中國史》(5 冊) 等, 這些以比較輕鬆、詼諧並選擇日常生活主題來寫作的中國史大量出現, 部分還成為暢銷書。這些書籍多半為中國作者撰寫、向外輸出的文化產物, 像是 1. 4. 5. 先有簡體版, 台灣出版社再簡轉繁輸入; 3. 是先有繁體, 再由中國出版社出簡體版; 2. 則是僅有台灣出版社的繁體版。顯然, 台灣社會沒有完全放棄這類型的寫作。對此, 筆者預計以另篇文章來搜集、分析與研究這塊範疇書籍所呈現的中國史知識圖景。

專業學術社群集體協作的成果，能反映學界研究中國的階段性成果，更可從中觀察隨時代演進而來的認識模式變化。惟須說明的是，筆者挑選這些翻譯出版的中國史作品，主要是因為，近十年間，書市少有台灣學界生產的中國通史作品，但幾個大型出版社卻積極引介、出版域外史著。兩相比較下，或許透露了學術界的研究方向和重心移轉，以及市場端反映出大眾於認識中國歷史問題的濃厚興趣。⁵ 第二種類別則刻意選取面向社會、採取大眾書寫形式，帶有較明顯呼應與介入現實問題意圖的中文歷史書寫，包括杜正勝（2023）《中國是怎麼形成的》以及劉仲敬（2017, 2021-2022）系列著述，將學術研究與現實目標緊密結合在一起。兩類著作跨越不同知識社群，從專業中國史書寫到面向大眾的通俗史論，均以「何謂中國」為核心，各自吸引不同讀者群，引發不同程度的注意和討論，形成龐雜的知識光譜。

本文透過知識史研究（history of knowledge）裡的「知識秩序」（orders of knowledge）概念來看待這個光譜，以簡化的比較研究幫助讀者掌握晚近認識中國的方式、內容和價值觀，產生何種變化。知識秩序是 Peter Burke（2016）提出的知識史基本概念，意指在特定時空環境、文化背景中，主要的知識形式及組織加上相關聯的社會與文化價值，共同構成一個體系，並且產生最具權威及解釋效力的內容。這些知識內容會由體系底下大大小小、不同層級與形式的組織，如研究單位、教育機構、博物館及私人團體，經過製造、教育和傳播，進一步強化這套知識結構和內容，成為人們理解和定義世界的基本方

5 受限於本文規劃與寫作期程等相關考量，有兩套台灣出版的中國史論著沒有納入討論。第一是聯經出版的「聯經中國史」書系，從上古到近代按照時代區分，共有九冊正陸續推出。因尚未完整出版，便暫不做討論。第二是楊照（2021）獨立撰寫的《不一樣的中國史》，共 13 冊。根據筆者初步閱讀和調查，楊照是採取比較幽默詼諧的敘事筆調，引證不像學術撰述那般沉厚，看似將這套書定位於跨越學術專業和大眾普及這兩個目標之際。這也使得該書籍呈現的歷史知識出現一些偏誤。例如，《不一樣的中國史》1、2 冊，就遭遇到幾位上古史學者撰寫的書評挑戰，指出有多處錯解史料（甲骨、傳世文獻、青銅器等物件），以及沒能引證學界較能接受之通說性二手研究的大小問題。〈是一家之言，還是超譯商周？讀《不一樣的中國史》〉（野蠻小邦周，2020 年 5 月 26 日），<https://reurl.cc/A3z5vp>。據此，筆者認為應先檢核這套書呈現之歷史知識的真實與正確性，進而考慮它之於「當代台灣中國史認識」問題的位置和脈絡性，因此暫不和域外學界生產之中國通史放在一起討論。

法，並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價值觀念。知識秩序概念有時間、空間界線的限制，是一種有邊界的知識發展和運作的總體經驗。國家可以是基本單位，但國境內也可能存有不同規模與核心，複數形式的知識秩序。這樣一來，研究者就能有效利用此概念來討論特定時空環境脈絡的知識史經驗，並操作不同國家之間，或是國家內部的歷時性與共時框架下不同秩序體系的比較研究。循此，本文得以將這些出版品所打造的知識秩序和舊有以「中國／中華史觀」為核心的知識秩序做對比，以利讀者明白當前社會在認識中國歷史的進路與方法上存有何種特點。未來更可用知識秩序概念完整討論「當代台灣社會的中國史認識」這個涵括五個經驗面向的複雜課題。

總的來說，本文旨在描寫這兩類中國史著的觀點和目標，通過歸納和比較新、舊知識秩序的特點及差異，說明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國史知識概況，接著嘗試反省這個變動中的知識秩序帶給台灣社會的可能影響。希望在本文研究成果基礎上，未來有機會延續，更具體探索當代台灣社會的中國史知識板塊，觀察隨時間層疊積累的知識層，如何不勻稱地鑲嵌在一起，形塑人們認識和想像「中國」的多種進路、方法與結果。

二、網格狀的「中國」： 東洋史學視野的中國史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誕生於自我與他者交往互動過程中。這種源於自他認識的焦慮感，讓日本學術界與出版界積極投入中國史研究及通史書系的生產和發行。其中，講談社與岩波書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近年，台灣先後翻譯出版了這兩間出版社的中國通史書系。我們可以注意到，社會大眾對「非中國人視角的中國史」較感興趣，甚至認為比較客觀可信，或許是這般原因讓這兩套中國史著容易吸引眾人目光。然而，本文並不是要討論這個知識與閱讀群眾、社會心態交錯

的問題，而是嘗試分析兩套史著部分論述的特點，及其之於台灣社會的聯繫性。以下首先討論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講談社的《中國·歷史的長河》，再分析岩波書店推出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筆者認為，兩套通史各自呈現了描寫中國歷史連續性的不同取徑。這部分延續了東洋史學的階段性成果，體現其方法論由先驗性的時代劃分，轉向對空間與地域歷史經驗的重視。總體而言，兩套通史環繞著歷史連續性的反省和思索，各自構築了一種描寫與解釋中國通貫性歷史經驗的特定取徑，從中推導出十分當代性的問題：「中國」究竟所指為何？中國何以為今日的樣貌？

（一）「朝代」作為時間基本單位：《中國·歷史的長河》

從 1970 年代以來，講談社陸續推出幾種中國史書系。按時間順序分別是《中國的歷史》（1974-1975，10 卷）、《圖說中國的歷史》（1976-1977，12 卷）、《新書東洋史》（1977，中國史部分共 5 卷）。而 2005 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長河》⁶則是第四套成果，與首套書系比，相距有 30 年。兩套書籍的執筆者，就是兩個世代的日本中國史研究者。《中國的歷史》編寫者為戰後中國歷史學研究的高峰世代，《中國·歷史的長河》則為改革開放的世代，他們恰好遇上中國開放，研究者能親臨歷史現場，運用更多樣化的文獻與物質材料，解釋的視角和理論資源更加豐富（伊原弘 2006）。與此同時，可能因為歷史知識與親身經歷可相互檢證的關係，《中國·歷史的長河》的作者群環繞著「何謂中國」所形成的疑惑與焦慮，更甚於他們的老師輩。

朝代史是《中國·歷史的長河》的基本骨架，也是書籍描寫與評估中國歷史時間經驗及特質的基本單位。循時間線索，史學家首先會想標誌出發生重大轉換的節點，並從第一個節點找到第二節點；兩個

6 日本原書系名為：新《中國的歷史》，為避免混淆，本文使用台灣翻譯書名。

節點框限起來的範圍就成為我們認識特定歷史現象的基礎單位。比較常見的單位是特定事件的起頭與結尾。《中國·歷史的長河》是採取「朝代」作為討論歷史轉換的基礎單位，朝代形成之初始、發展與崩落是總成這段歷史經驗的範疇。朝代史並不是特別的論點，甚至是十分常見的做法。書系作者群都肯定王朝轉換是關鍵歷史事件，可揭示政府治理政策在哪種時空環境採行何種策略，遇到哪些特定事件或變異，造成在哪個環節遇到無可解決的困境，以及社會與人民會在何種瓶頸下發展出對新政權的另種期盼並採取行動。書系編輯委員尾形勇特別指出，拉長時間看，改朝換代現象是一種維繫「以皇帝作為權力頂點之中央集權專制體制」的「安定體系」。改朝換代並不單純是歷史過程的反覆重演，反而是中國政治思想特有之「公權國家的輪替」觀念的實踐。皇帝統轄權不會專屬於某家某姓，而是依歸於某種正統性賦予的公共權，在此之下完成國家框架（尾形勇／陳柏傑譯 2017: 19, 22-24）。於是，研究者就可在這個政治轉換機制上，將「朝代」作為基礎尺度，比較與衡量不同時空環境條件下不同王朝之歷史經驗與意義。

按照朝代排列形成的線性時間序列，是把握這個書系歷史論述的主要軸線。然而，用線性時間來理解長時期的中國史，很容易遇到時代分期這個攸關經驗均值化與先驗性標準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歷史的長河》雖未能突破「朝代史」框架，但仍是在東洋史學「時代特質論」基礎上做出新嘗試。這套書從兩個面向來突破線性時間的難題。第一，書系作者沒有使用源自於西方歷史經驗的「上古、中古、近世、近代」劃分，作為判定歷史階段特質的先驗標準和框架。第二，以朝代史為基礎，將這條時間序列隱隱然分割成幾組時間區段，以此單位呈顯中國歷史變遷的軸線與特性。如此一來，讀者既得以發現朝代更迭的連續與斷裂，亦可集合多個朝代經驗和特質形成關於中國史的區段認識；更得以在長時段尺度上依循不同時間層次往前或往後延伸思考。下文會擇幾個區段為例來說明。

《中國·歷史的長河》時間區段的劃分及其特性，通過比較研

究更能清楚呈現。宋史研究者伊原弘曾比較 1974 年 10 卷冊《中國的歷史》和 2005 年的 12 卷冊《中國·歷史的長河》，指出幾點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隋唐以前的內容增多，特別是古代史範疇細分為「神話至夏王朝」、「殷商與春秋戰國」，並增加「東漢至三國」這個長時期視野的三國時代。第二，將元、明兩代切分成兩個朝代討論。第三，明、清兩代則做成一冊，思考兩代之間的連續性問題。整體來看，《中國·歷史的長河》削弱了「中間」時段分量，也就是中國由中世轉入近世，減少隋唐至五代、宋的部分，並增加了中國歷史「前、後」兩個時段之篇幅（伊原弘 2006: 274）。

《中國的歷史》與《中國·歷史的長河》卷冊比較

《中國的歷史》1974 年版	新《中國的歷史》2005 版
從原始到春秋戰國	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
秦漢帝國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商與春秋戰國時代
魏晉南北朝	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
隋唐帝國	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
五代、宋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元、明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清帝國	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
近代中國	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
人民中國的誕生	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圖說中國歷史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
	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

伊原弘指出的幾項變化，反映新一批東洋史學者對於中國歷史區段所提出的新問題、觀察與解答。以下先針對他討論的「前、後」兩個區段做進一步申述，這部分可作為觀察幾個朝代之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之總體經驗的例證。首先，明顯增加分量的「前段」時期，尤其是仔細描寫「中國形成和初次的分裂與擴大」的歷史過程。這當然得益於許多這個世代陸續出土的各種材料，以及結合考古學、人類學

的跨學科合作。書系新編排了三冊書，《神話時代與夏王朝》（宮本一夫 2005 / 郭清華譯 2018）、《殷商與春秋戰國時代》（平勢隆郎 2005 / 李彥樞譯 2018）、《秦漢帝國》（鶴間和幸 2004 / 李彥樞譯 2018），描寫神話時期夏、商、周不同「文化圈」分散在東亞大陸，相互競爭支配權，逐漸發展成秦漢時期的統一狀態。《東漢與三國時代》（金文京 2005 / 林美琪譯 2018: 25, 32-33）則指出，三國是秦漢帝國崩潰後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中國」初步產生南北分區發展，部分區域嘗試循海路與東亞世界產生聯繫，惟三個獨立王朝均展現強烈的「爭正統」、「尋求統一」的政治目標；這些都成為日後「中華世界圈」逐漸擴大的基礎。也就是說，看似是秦漢這類統一政治勢力的斷裂，但屬於內核層次的政治意識、思想仍有明顯的連續性。質言之，在中國崩潰與擴大的過程裡，我們更應該仔細考量這些曾經被遺漏的環節。

其次，增厚的「後段」時期，則深化我們對於「中國轉型為近代國家」進程的理解，並透過內亞史與海洋史視角，將這段歷史經驗放入全球脈絡中。書系編排方式的變動——獨立呈現元代，將明清並置——說明了 2000 年後觀察「元、明、清」三朝的特點。其中，《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杉山正明 2005 / 郭清華譯 2017）運用內亞史取徑，劃了一個橫跨八世紀中葉至十四世紀的長時間歷史段落，呈現活躍於亞洲內陸草原的各種遊牧民族如何競逐統治權，進而建立一個跨地域的蒙漢複合性帝國；並且與宋史一冊構成觀察十世紀以降中國史的兩條軸線，時而平行、時而交會。《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上田信 2005 / 葉韋利譯 2017）運用海洋史視角描寫中國通過「東歐亞」區域和近代世界交流互動的線索，進一步思考明、清兩代如何在拒絕與承接元帝國遺緒的前提下，先後建構陸地型態以及陸地結合海洋型態這兩種不同的政權。很明顯的，這兩冊嘗試去勾連三個朝代之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並突顯每個王朝面對不一樣的外部挑戰，做出相應的調整以形塑該段落歷史經驗的總體特徵。至於近代到當代部分，《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

國》（菊池秀明 2005 / 廖怡錚譯 2017）、《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巨龍的胎動》（天兒慧 2004 / 廖怡錚譯 2016）共同指出，國、共政權的本質有許多相似處，兩者都承接清王朝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的歷史遺緒，這部分的歷史經驗是理解現、當代中國特質的關鍵線索。整體看來，這個時間區段的歷史呈現了中國從元明時期以降，就通過不同的交通管道和域外不同區域、民族、文化產生頻繁交流。這些經驗不僅止於一種外部資源，更是直、間接地參與了中國形構的歷史過程。

誠然，一般讀者很可能無法體察與掌握學術史的流變，但這些變化很可能切合了台灣讀者對於書寫中國歷史的特定想像，特別是「中國形成和初次的分裂與擴大」和「中國轉型為近代國家」這兩個區段的歷史經驗。前者牽涉到對於早期中國形成過程中多元特徵實際存在的肯認，也就是「統一形式的王朝政權」並非先驗性歷史特質，而是在諸多條件下逐漸形成的歷史事實。至於後者則牽涉到中國和域外世界互動的程度，以及相關經驗如何形塑了中國歷史。這部分在下一節討論《哈佛帝制中國史》時會看得更為清楚。

（二）將空間當作橫向時間軸：《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時間為史學研究的依循基準，但也可能帶來盲點，特別是以朝代為歷史時間之基本單位的做法。2020年前後，岩波書店在「岩波新書」書系裡策劃一套5卷冊的中國史，嘗試突破「朝代史」的可能限制。創立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岩波書店，其「岩波新書」系列誕生於1938年，彼時中日戰爭剛剛爆發。不同於「岩波文庫」書系以普及經典為目標，「岩波新書」書系秉持「現代人的現代教養」精神，旨在撰寫、出版新書，嘗試用廣泛的知識來回應當時瀰漫於社會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岩波新書」收錄過一些通史，包括日本史與中國近現代史，2020年前後製作的中國通史是書系首次嘗試。更重要的是，這套中國史採取了有別於既有通史的書寫架構，主要展現作者群

對於線性時間的深刻反省，以此向社會大眾重新描繪中國歷史的複雜面貌。

台灣社會幾乎是在沒有時間差的狀況下，接觸到這套新的中國歷史論述。2021 年，聯經出版公司就推出中譯本，成為當時出版市場與知識界裡最新的中國史叢書。為推廣叢書，聯經舉辦「如何建構，怎樣史觀？劍橋、哈佛、岩波，書寫中國通史的多種可能」線上演講，邀集岡本隆司、卜正民、李孝悌、林載爵，討論關於日本、歐美和中文學界的中國通史寫作特點與問題；前兩位分別是岩波和哈佛中國史書系總編者。⁷ 演講特別將這套書定位為別異於劍橋中國史（1978-2020）、講談社中國史與哈佛中國史，突顯其主要特色——以多元區域來描寫「中國」發展與形塑的歷史過程——這也是書系為突破線性時間限制所採取的歷史書寫基調。岩波中國史書系的反省與調整分成兩個層次。第一是朝代更迭觀念，作者群（渡邊信一郎等／詹慕如譯 2021: 6）提及，「按照時代的興替進行撰寫」是共通的「編年史」寫法。然而，以中國龐大量體和綿長連續的時間，單純以「王朝交替史觀」無法總攬內部多樣面貌。朝代更替的視野可能會遮蔽某些歷史連續性，這一點和講談社書系明顯不同。第二是歷史分期觀念，書系總策劃人岡本隆司（2020／郭凡嘉譯 2021: 251）指出，中國的歷史經驗或許不能像日本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更多的時候是「時代的區分模糊不清」。歷史分期是為了更好掌握特定時代下歷史經驗的總體特徵，惟分期依據卻總是無法擺脫以西方經驗為基準的窠臼。再者，中國地域廣幅，多樣性豐富，不同區域並不一定都位處於同樣的時間進程，以單一歷史分期來建構概括性認識，會在無意間弭平區域落差，反倒看不清楚時間與相應的經驗特質。整體來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是在「如何超越『朝代』認識框架」以及「對歷史分期的反省」這兩個問題基礎上，捨棄編年史架構來靠近中

7 〈如何建構，怎樣史觀？劍橋、哈佛、岩波，書寫中國通史的多種可能〉（線上演講，岡本隆司、卜正民、李孝悌、林載爵，2021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facebook.com/linkingbooks/videos/812185929604884>

國歷史的多元面貌。

在這些考量之下，岩波書系選擇以「空間」為取徑來還原中國歷史的多元性。書系以「空間」為特定視角的做法，和講談社中國史形成強烈對比。更進一步說，我認為岩波書系是將「空間」，亦即出版社廣告所強調的「地域」，當作一種橫向時間軸；中國歷史就是這些橫向時間軸互動與連接的複雜進程。⁸ 書系以中原、江南、草原、海域四個區域為主軸，呈現各區在共時及歷時架構中的發展，以及「中國」的完成（請見圖1）。這種寫法呈現了六個特點。第一，將空間視為橫向時間軸後，就可將「中國」看成是包含中原、草原、江南、海域四個橫向時間軸的龐大、複雜時間量體。第二，每一個橫向時間軸發展時機和進程都不一樣，有先後，也有平行的部分。例如，魏晉至唐是統一王朝在中原的建構，但從結合內亞、中國和東亞範疇的「歐亞大陸東方史」角度看，卻是游牧民族從北方草原發展之初機（古松崇志 2020 / 黃耀進譯 2021: 30-32）。再者，這階段也是南政權嘗試開發江南經濟，並透過海洋深入至東亞地區，打造「船的世界」之基礎（丸橋充拓 2020 / 林琪禎譯 2021: 15-16）。四個橫向時間軸相互連結的過程，是中國特殊的歷史經驗，研究者得以審視連結的細節和經驗。第三，促使橫向時間軸相互連結的因素，是在其中生存與活動的人群及特定政治體。第四，參與這些橫向時間軸的有漢民族和多元非漢民族，他們在不同時機，從不同空間帶來資源和挑戰。第五，秦漢、唐、元、清四個政權的活動和統治力，有逐漸擴大和轉移的趨勢，跨越了單一橫向時間軸。第六，四個橫向時間軸可以被看成小寫的「中國」，多元並存的現象可能才是慣常的中國歷史經驗，跨時間軸統一王朝則是長期歷史中的短暫現象；而清朝達成四個橫向

8 筆者此論是受汪暉《世紀的誕生》談空間革命、橫向時間啟發。汪暉用這概念來講述二十世紀歷史，認為空間革命讓很多區域因頻密交流互動被壓縮在同一時區內，因此不能只用縱向時間線來觀察二十世紀。要把這段歷史想像成一個龐大共時空間內的多重橫向時間軸，其接受現代性的程度和進度差異，展現了這個共時空間的不均質性（汪暉 2020: 42-45）。若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將「中國」看作是由複數的橫向時間軸組成。筆者認為，這種視角會比單純從地域或區域的空間角度出發，更容易形成帶有問題意識的時間感。本文即是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岩波中國史。

時間軸的統一，則是當代中國的雛形。整體來說，這套書系如實反映日本史學史從時代區分論轉型為地域研究的成果，並挑戰了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覆強調的，大寫、一體化中國的歷史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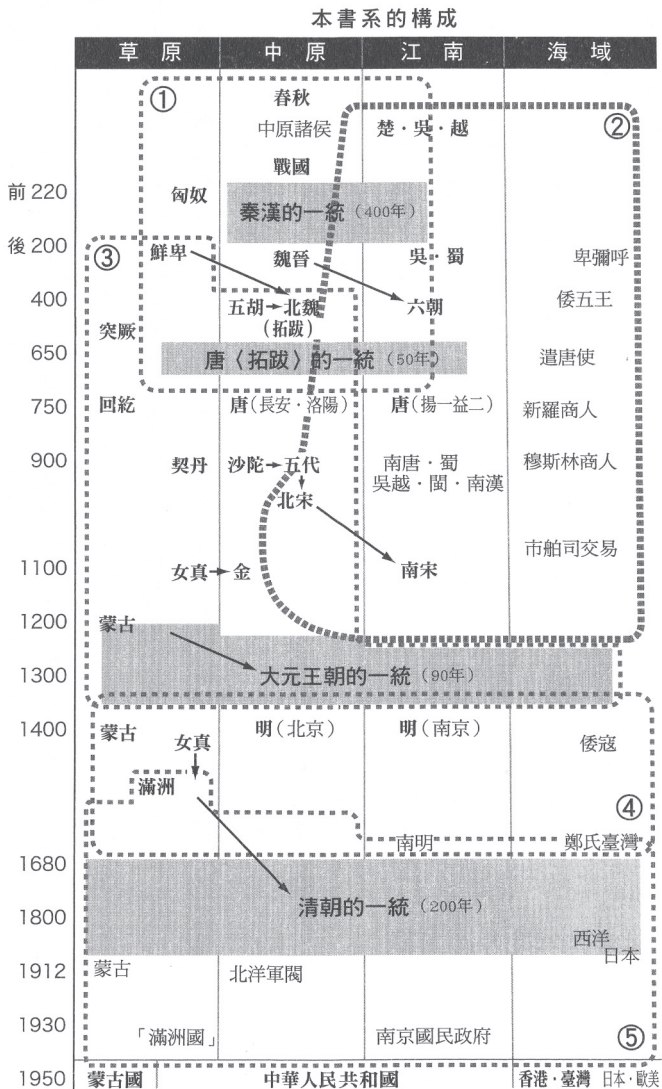


圖 1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本書系的構成
資料來源：渡邊信一郎（2019 / 詹慕如譯 2021: 8）。

不同政治力量的建立、移轉、競爭與重置，造成了橫向時間軸的互動與連結。這種發生在區域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串起書系的政治史、經濟史與社會史線索。不同區域的多樣生態與環境，帶來相異的資源、刺激和限制，影響地方人群的生活與活動。當有政治體嘗試規制與管理時，就會產生制度設計、運作以及人民如何適應與反應的問題，「國家如何治理統治區域」可說是跨越中國長時段歷史，不同地方的關鍵課題。綜觀這套書系，這個問題最早起源於「中原」殷周的「納貢－重新分配」之政治、經濟、社會機制（渡邊信一郎 2019／詹慕如譯 2021: 60-61, 66-68）。這套制度經歷兩漢帝國時期，加入儒學、倫理與宗教的元素與概念，形成在「中華」範圍擴張過程裡，中央政權嘗試對逐步收攏進來之區域施行管理的基礎制度，也就是貫穿整個書系的「古典國制」概念（渡邊信一郎 2019／詹慕如譯 2021: 146-149）。讀者循著「古典國制」概念所鋪設的線索，制度建構與施行過程遇到的挑戰與轉變，即可在中原、江南、草原、海洋四個橫向時間軸上看到，不同政權如何採納、革新與施行「古典國制」，來因應這幾個地域帶給統治者的挑戰。

更甚者，從地域、空間形成的多元視角，說明了從小寫「中國」到大寫「中國」的歷史過程。這套書系甚至將這段歷程描述成兩股交織互動的力量，反映中國歷史經驗的特質。書系各冊作者在討論「一個／一元性中國」問題時，都表露了類似觀點。《江南的發展》（丸橋充拓 2020／林琪禎譯 2021: 239-240）提到，日本學生對中國疑問的大宗，是「為何中國並存『一元性的志向』與『多元性的放任』兩種特質？」該例證顯示了，這並不單純是日本中國史研究者的認識，更普遍成為日本社會對於現代／歷史中國的認知。岡本隆司（2020／郭凡嘉譯 2021: 245-249）主筆的《中國的形成》，更以近代東亞多元性及清朝多元共存體系的角度，論述從清王朝到現代中國的進程中，多元和一體兩股力量互動和競爭，由此思考當前關於「一個中國」論述的可能和有效性。

總結來看，兩套書系展現了觀察與評估歷史經驗的不同側重處，

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兩書系在詮釋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及關鍵因素上存有顯著分歧。講談社以朝代更替為歷史轉變的節點，使得各冊作者都特別關注特定事件扮演的角色和影響力。讀者在書系裡可以清楚看到，特定事件可能改變該個朝代（甚至更長時段）的歷史結構。例如，杉山正明（2005 / 郭清華譯 2017: 62, 75-76）將安史之亂定位為，八世紀末至十三世紀，改變草原與中原區域歷史結構的關鍵事件。這種強調「事件」影響力的做法，未來也許可從如 William Jr. Sewell（2005）對於「事件」（event）的看法，進行關於時間性與因果關係的比較研究。相較於重視朝代內特定事件催生的槓桿效應，岩波書系明顯是在長時間區段下，觀察生活在特定地域人群產生的各種實踐與影響。雖然，書系並未言明循年鑑學派取徑，但仍比較清楚展現了，作者群重視自然環境和地理空間的結構性因素，多過於特定事件的影響力。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對於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詮釋，也間接反映了西方史學對於現代日本史學的可能影響。

再者，兩書系分別從時間與空間的角度，建構一種網格狀視角。研究者將時、空間範疇相對化與層次化，形成一種近似網格狀視角來描寫中國歷史經驗，進而思考「何謂中國」這攸關近代日本自他認識脈絡的重要課題。《中國·歷史的長河》編輯委員之一的鶴間和幸（2005 / 陳柏傑譯 2017: 84-85）援引費孝通「多元一體格局」概念指出，我們從外觀看中國是龐然一體，但若靠近細看就會發現它是由一小格一小格的格子相互連結形成。也就是說，研究者觀察、分析的尺度和量體應該盡可能限縮到一定幅度，在有限的時空間架構下描寫多元小寫的「中國」，逼近真實；進而考慮龐大、一統、一元之「中國」形成的進程與可能問題。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做區別，講談社書系是將線性時間分割成網格，以王朝為格子的邊界；岩波書系則以四個空間—橫向時間軸為網格，觀察底下人群和政治體的活動。值此，兩套書籍其實展現了，當前我們考慮「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各類問題時應該採取的視角。

詮釋歷史變遷的主要因素和分析歷史的基準單位，這些方法和理

論都是史家為了更好地把握過去，推測何以發展成現代模樣時必須考慮的問題。長久以來，東洋史學者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個能跨越長時段、連續性且涵納區域多樣性的歷史敘述，以勾連傳統文明和現代中國兩者的可能關聯，促進日本的中國認識（鶴間和幸 2005 / 陳柏傑譯 2017: 67-68）。釐清歷史來增益自己對於中國現狀的理解，這目標清楚展現在講談社與岩波中國史書系中。前者特別規劃一冊《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後者則是讓這個問題意識貫穿於各書冊探索的歷史範疇與現象中，嘗試以多元敘事來檢視中國各處的發展、變遷與「現代中國連結的歷史過程」（渡邊信一郎等 / 詹慕如譯 2021: 7）。這些史家沒有明說的部分其實是，兩書系建構的網格狀中國，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與共產黨政府強調的那種一體化、鉅型國家之「中國」想像，其實缺乏歷史根基，乃是一種虛構的國家敘事。兩書系描寫的歷史經驗正好為這樣的虛構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中國所指為何？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也長久困擾台灣。兩套書系建構的「網格狀」視角，可讓社會大眾在反省原有史觀對於時、空間線索既定看法的基礎上，一格一格地重建歷史脈絡，進而回答環繞著中國的歷史與當代議題。

三、非傳統「中華帝國」的「中國」： 《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清史

用「帝國」 / 「帝制中國」（Empire/Imperial China）概念解釋中國歷史，是《哈佛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的作法。這套書由明史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持，將秦到清朝的歷史分成六段，由四位作者執筆，自 2007 至 2010 年間陸續出版。書系的「帝國」概念，反映戰後美國歷史學界慣常運用「帝制中國」（Imperial China）來概括指涉從秦代開始至民國以前的「傳統中國」歷史。與早前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涵蓋上古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不同，哈佛書系以「帝國」作為指引，截斷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學術論爭，很自然地從「秦漢」展開帝制中國的歷史敘述（葛兆光 2016: 2-3），並收束在清帝國，作為傳統帝國的終結，也是「現代中國」的開端。質言之，書系是從時間的角度將「帝國」當作區分傳統和現代中國歷史經驗的基準。

然而，「帝國」牽涉的複雜歷史經驗，原書系未有說明，台灣翻譯本也沒能做進一步梳理。這容易陷入「傳統中國是帝國嗎？」的問題邏輯，引起概念誤會和歷史評價的論爭，特別在中文學術界和語境裡頭。譬如讀者可能將「帝國」等同於「帝國主義」，聯想到殖民型態的歷史經驗。在討論明、清擴張歷史時，如果直接用「帝國」概念來描述，就很容易在評估層面上形成「帝國主義」和「殖民」交互誤用的狀況，進而引發爭議。事實上，西方的「帝國」（empire）概念之於中國，從來都不是不證自明的標籤，而是經過近現代時期重層文化互動和知識交流，才形成我們現在慣常用以研究和分析中國的概念工具（歐立德 2014；藍弘岳 2022）。書系將「帝國」設定成描寫與評估中國歷史的先驗工具，幾位作者卻沒有進一步說明自己關於「中國作為一種帝國」的定義，實屬可惜。不過，在最寬泛的定義基礎上，書系的「帝國」概念仍反映了 2000 年代「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取徑和全球史面向（Ghosh 2012）。這一方面可呈現中國內部的多元歷史線索，另一方面則可將中國和域外世界發展之經緯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再是想像中自立於亞洲中心的帝國，而是經由和北亞、南海區域的互動，與更遙遠之他方產生緊密連結的帝國，更是一個不斷嘗試在異質化區域上建構一元統治效力的龐大帝國。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書系主要想呈現的歷史線索。

在這樣的帝國史架構下，書系劃分出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六段，呈現「中華帝國形成、分裂、擴充、中期轉型、通過陸、海交流與世界產生交集和分歧、走向末期」的主要脈絡，並保留朝代興衰的時間線，突顯「正式統治者的改變」以及「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的變化（卜正民／王興亮譯 2016: 16）。卜正民預設，讀者

可以從王朝變化的時間軸線，把握不同型態的「中華帝國」在設計和治理帝國的理念，以及相應的社會組織和地方人民生活樣態，進而理解「中華帝國」的歷史經驗和特質。

《哈佛帝制中國史》中譯本很快就於 2010 年初在台灣發行，惟出版過程因素影響，僅有元明和清這兩冊問世。台大出版中心在 2013 年翻譯出版《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麥田則於 2016 年出版《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相對的，中國在 2016 年即出版全套譯本。顯然，中國社會對於域外人寫自己的歷史特別感興趣，因為這很可能挑戰他們既有的知識與價值。台灣社會的部分，元明和清代兩冊的出版，可能也反映了讀者對於中國歷史某些段落與相應歷史解釋比較集中的興趣和關注。⁹此外，從實務面來論，拆分出版應該較容易為社會大眾接受；全套的簡體翻譯本很可能僅得在學術社群內流通。接下來，我不做全書系內容的討論，而是集中分析元明和清代兩冊的內容和特點。一方面，斷代史形式確實是台灣多數讀者接觸《哈佛帝制中國史》的經驗；另一方面，從這兩冊書入手，應該更能考慮中國史論著之於台灣社會的知識史問題。

首先是對於帝國崛起和崩落之結構性因素的重視。這見於《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卜正民 2013 / 廖彥博譯 2020）一書，作者採用氣候變遷的宏觀視角，建構了元明兩代的基礎背景，以解釋該時空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顯著變遷。誠然，史家會追問「氣候是否真的顯著影響歷史？」卜正民的做法確實引發部分討論（Clunas 2012; Wang 2012），但這確實是近幾年史家研究十四到十七世紀中國史時可能採取的做法——側重環境這

9 這裡可以稍加補充的是，根據筆者對台大出版中心現任編務總監湯世鑄先生的訪談（2025 年 4 月 16 日），當時出版中心是經由一位老師推薦，簽訂了清代這冊來製作中譯本。其後出版中心曾想進一步製作整套中譯本，但中國出版社已簽訂並開始進行出版作業。出版中心多所考量後，未持續推進這項業務。筆者目前僅尋得台大出版中心的資訊，還未能對麥田出版社進行訪談，僅能說明至此。這裡要感謝台大出版中心洪麗歲女士的協助，才能順利訪問到湯總監。

類結構因素，從特定角度觀察歷史變遷，再進一步判斷王朝歷史連續性。不同於講談社中國史用「海洋史」因素將明清兩代編排在一起，卜正民筆下的元、明連續性，雖也論及兩朝皇權專制特性這類傳統議題，但全書顯為另一種研究視野所導引出的歷史敘述。該書對於環境和氣候變遷這種結構性因素的重視，在台上市後引起大眾注目，這很可能顯示了台灣讀者對於政治、社會、經濟面向的傳統歷史解釋感到疲乏，以及對非主流歷史解釋的興趣。

再者，移轉空間視角，將視線從中原大陸挪開，以發現並勾勒另一群歷史主要行動者的身影。這可見於《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作者 William T. Rowe（羅威廉 2012 / 李仁淵、張遠譯 2016: 6-9）循「內亞」（Inner Asia）視野，引導讀者重新認識與考慮滿洲人建立王朝、打造多民族帝國的歷史特點與意義。於是，原本在「漢化」視野下不被考慮的滿洲人以及蒙古人、藏人等邊疆民族都回到歷史舞台上。史家必須重新思考位於舞台核心的滿人，如何設計治理體制來管理這個版圖雄大且內部複雜的鉅型帝國。也就是說，研究者用滿洲性取代漢人性，將清朝從中華帝國轉為中亞型態帝國，甚至脫離中原王朝的終始循環序列，成為一個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另一方面，不再從「衝擊－回應」角度理解清帝國中晚期變化。原本被扁平化的帝國身影，重新回到全球脈絡後，是能夠和鄂圖曼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拿破崙帝國相互比較的角色。清朝不再僅是中國史的末代王朝，而是能夠代表並說明世界史上陸權帝國於近代逐漸走向衰敗的某種歷史模式。

上述兩項特點讓我們看到元、明、清帝國的部分特質，也揭露了台灣社會對於幾種特定歷史研究、解釋方法的高度興趣，以下分成三個面向來說明。第一，帝國領土廣闊與內部異質性高，大寫與小寫「中國」共時、歷時並存的事實。第二，帝國在不同階段會與不同區域形成頻繁且高密度的交流互動，具有對外擴張、企圖建構基礎統治秩序的型態。第三，帝國之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特別是對「清帝國」的中華與中亞性產生論辯。這三個面向與台灣讀者感興趣的幾種

詮釋十四至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方式，呈現明顯的呼應關係。首先，反漢族中心以提倡多民族異質性，明白漢人不一定能主宰帝國歷史，北方遊牧民族也扮演決定性角色。其次，注重與世界歷史互動，改變以中原大陸為核心的視野，焦點移往更寬闊的洲陸或海域，更多元地思考帝國歷史。再者，思考盛清的獨特性，以及其和當代中國的關聯，特別是循「中國為何是現在這般面貌」的問題意識來閱讀清史，進而出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當代新型「帝國」的論點。從學術史角度論，這三個面向清楚對應了內亞史與全球史，台灣部分讀者確實對這兩種研究取徑展現濃厚興趣。

這兩種研究方法從根本上挑戰了過往以「中國」和漢人為主體視角所建構的歷史敘述。這裡先進一步說明全球史的部分，下一節的例子則可說明內亞史的部分影響。舉例來說，台灣商務在 2021 至 2024 年，用同步日本出版的效率，翻譯出版了日本山川出版社的《歷史的轉換期（11 冊）》套書。山川是專門編寫教科書性質的出版社。該書系採取橫切面視角，選擇 11 個時間點，描寫歷史變化的共時性特徵，突顯個別地域獨特發展與相互連結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書系如同岩波新書，將空間當成橫向時間軸，重組時空間框架來觀察歷史變化。像是 1348 年氣候變異帶來的自然環境變異，以及 1919 年世界各國在革命後對於「現代」界線和特質的探索。在這種視角與書寫方式下，中國內部的諸般變化就不再是獨特文明量體的行動，而是在特定時間下，與其他區域面對相似問題的實踐之一。中國的歷史經驗更是可與其他地域、國家比較的全球政治、經濟、社會與思想史材料（千葉敏之 2023 / 陳嫻若譯 2024；木村靖二 2022 / 黃鈺晴譯 2023）。我認為，這類型的全球史論著確實在學術層面上幫助研究者認識到轉變區域視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對於一般讀者的歷史認識和知識建構而言，這類做法可能會加重「非中國行動者」的分量，進而稀釋掉漢人和「中國」作為歷史主體行動者之意義與重要性。

近幾年來，書市動向確實是往這個方向發展。應該這麼說，出版的商業利益建立在市場風向和目標讀者上，而特定論述、思想和觀念

的傳播則與出版、閱讀熱潮相輔相成（Darnton 1979, 1995）。在這樣的知識基礎與趨向中，《哈佛帝制中國史》展現了重新勾勒中華帝國的嘗試與各種可能性；這正好賦予台灣讀者解構傳統一元性帝國的思想資源，並有機會重新評估歷史經驗。更進一步說，台灣沒有出版書系中元代以前的部分，反倒彰顯了元明和清這兩冊之於台灣社會在歷史知識與觀念上的特別關聯性。歷史現象裡的「沒有」與「有」，是兩個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面向；前者更能襯托後者的特點及重要性。當這套中國通史被簡化為《掙扎的帝國》與《中國最後的帝國》進入讀者視野中，也就代表了我們可能從帝國歷史最為多元、全球化且脆弱的段落，展開關於非傳統「中華帝國」型態之「中國」的想像、探索和書寫。

四、從歷史解構「中國」： 杜正勝與劉仲敬的中國史論

以質疑歷史連續性和一元性為出發點，近幾年來，台灣書市展現出對於中國歷史之多元、異質和非連續性的興趣與關注，並展露明顯的現實目的。是故，這類史著往往更容易吸引一般讀者。本節討論的杜正勝、劉仲敬就是其中佼佼者。他們都是從「中國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出發，企圖在歷史裡尋找解構「中國」——那個存在於某個世代台灣人心中的「幻想烏托邦」——的幾許線索與任何可能性。¹⁰

2023 年出版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是杜正勝綜合學術和現實面向提出的「中國」論述。該書論點原型出自 2020 年的「重新認識中國」講座，其後先以期刊論文形式提出基礎概念（杜正勝 2022），很快就成書出版。他自陳這問題「始於一種學術探索，當初

10 〈永遠與現實對話：杜正勝從人生歷程談向歷史及《中國是怎麼形成的》〉（OPEN BOOK，吳雅婷、劉靜貞，2024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168>

的現實感還沒有後來那麼強烈或自覺」，也不諱言強烈自覺的部分，意指台灣從上世紀 50 年代起始，經歷了「『自以為是中國』到發覺『其實不同國』的變化」（杜正勝 2023: 10）。學術探索部分，他憶及 1999 年曾嘗試討論中國古代社會成形的課題，當時就圍繞著「一元性與大一統」這個由費孝通開啟的多元一體格局，觀察古代中國政治和文化範疇在邁向統一、同質化過程的複雜關係。自那時起，杜氏就注意到「漢文化的一元性」與「政治的帝國一統互為表裡」。也就是說，要在古代史階段考慮「何謂中國」，就得循政治範疇和文化實踐互相影響、收束的線索（杜正勝 2023: 11-12）。

在漫長歷史中逐漸形成高度同質性範疇，這個看似存在的歷史趨勢正是學界針對中國史「連續性與一元性」反覆辯證的核心課題。把握這個課題的兩個組成部分，或許就能比較適切地說明「中國何以為今日的模样」。這正組成了《中國是怎麼形成的》的核心論點。從時間維度描繪歷史過程，從空間維度觀察同質性範疇的出現及其對異質性範疇的影響，兩者共同揭示了中國形成的變化與趨勢。杜氏想藉此進而把握中國歷史的本質。

時間分期能進一步將歷史經驗裡的特質概念化。《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提出「萬年中國三期論」新分期法，企圖在盡可能長的歷史時間內，用盡可能少的切分方式，描寫中國形成的關鍵轉折點並評估其特質。這種做法奠基於杜氏早年完成的《周代城邦》（1979 年）和《編戶齊民》（1990 年），使其得以從政治實體與人民百姓的制度性互動來考慮此問題。杜氏將中國史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社會時代，起於距今一萬年前，延續五千年之久，由中國北部至南方，呈現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系統。第二階段是城邦時代，大約相當於傳統史學描述的五帝和三代。城邦是有城牆之大型聚落構成的基礎國家型態，城牆即為統治力量的界線；眾多分散、獨立的城邦，依照政治軍事力量強弱，彼此結成聯盟，形成此時期的中國。第三階段進入編戶齊民時期，各個城邦相互征伐，並嘗試將統治力擴張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央集權帝國的國家形式，從春秋戰國一直延續到民國。杜氏的

分期方式，迥異於西方歷史經驗的「上古、中古、近代」以及馬克思主義階段論，卻能跨越朝代興替之編年史的可能障礙，直指中國政治形態與社會構成的特徵（杜正勝 2023: 21-26）。簡言之，通過這種分期視野能夠看見中國史的本質——以政治目標為出發點所形成的各種觀念與行動。

空間部分配合時間的線索。在杜氏筆下，中國範疇的形成和擴張，與政治社會結構發展若合符節。首先是「華夏」集團與意識在城邦時代出現，成為城邦聯盟用以建構我群和他者認同分別的工具。「我者」互稱「華夏」，他者即是非華夏的蠻夷戎狄，這類說法遍見於古典文獻（杜正勝 2023: 58）。接著則是戰國時期出現「中國」這個字詞和概念，逐漸取代「華夏」指涉的範圍，但仍保有彈性範圍。直到秦漢編戶齊民階段才建立，東止於海，西以隴西為界，北至河套，南抵嶺南的「中國本部」範圍。也往往是從這時候起，人們會用「版圖」來描述帝國統轄範疇。杜氏指出，「版」為官府登記的家戶人口，「圖」涵括山川、道路、城邑、村落的地圖。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問「中國的範圍」或「版圖」，其實是在思考：帝國中央政府能在哪個特定範圍建構統轄全國土地和人民資源的政治社會結構（杜正勝 2023: 85-86）。這樣來看，從秦到清的歷史，應該理解為帝國向外擴張，嘗試將非版圖的資源納入編戶齊民系統，直接統治地方的複雜過程。

於是，從杜氏捕捉的歷史本質來看，中國應該是環繞著編戶齊民理念形成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帝國。杜氏強調從城邦邁入編戶齊民的分野，在此之後，中國的歷史經驗都未脫離這條軌道。出現在中國領土上方的就是這種一元式政治實體，這般政治社會結構讓「政治力量獨大，社會力量萎縮」的中央集權形制牢不可破（杜正勝 2023: 29）。¹¹《中國是怎麼形成的》的論點，其實與杜氏在 1990 年代的

11 現在較少有學者會用類似零和角度，放大一方力量，削弱另一方影響和作用力至零。中國史基調確實是政治力由上往下進入社會基層，在往下延伸的過程，會遇到既有結構與權力合作、競爭和挑戰的問題。這點在當前的地方史研究已有蠻深入的研究。當

論述有明顯連續性。或許，2020 年以後時代氛圍的變化，迫使他將問題想得更透徹。「古典是基因，傳統只是現象，當下即在其中」，杜氏在書末將「何謂中國」問題帶回到當代世界（杜正勝 2023: 289）。藉由他的觀點，我們或可進一步理解，當前中國採取民族主義姿態來回應關於「中國」定義、範圍與內涵元素（人民、族群、資源）疑問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範疇是由帝國政治社會結構所建立，質疑「中國」就等同於試圖挑戰和削弱這個將內部多元異質性扭合為一體的政治性結構。

和杜正勝嘗試理解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做法完全相反，旅美四川作家劉仲敬企圖裂解這個連續性，進而從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上挑戰中華帝國的必然性。這大抵是他的著作吸引台灣讀者的主要原因。劉仲敬做英國史起家，從歐洲史角度來觀察、比擬和考慮中國史，主張中國應該像歐洲走向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方向，從一個大一統帝國分裂為多個小型國家。這種「諸夏主義」的說法，散見於其學術與政治言論中。他認為，當前中國是「作為大清帝國的替代物而提出來的」，是時之清帝國正像奧匈帝國般，走向分崩離析的結局，而中國唯有走向解體，才是對中國人最好的結局（劉仲敬 2022: 216）。總的來說，劉氏否定像傳統中國這種「古老的中央集權型帝國」，直言那是一種「文明的灰燼」（劉仲敬 2022: 25）。

劉氏的著作乘著「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這股學術文化風潮，逐漸為台灣讀者所認識。這是值得注意的知識史現象。環繞著漢化與滿洲性，新清史論爭起源於 1990 年代中期的漢學界，至 2010 年左右開始成為中國與台灣學術社群關切的課題之一（徐泓 2016；劉文鵬 2010；汪榮祖 2014）。大約與此同時，具有滿洲血統的出版人富察成立八旗文化，運用「八旗」這個很能標誌滿洲特性的名字，開始向台灣社會輸出新清史相關著作。此後，八旗文化、專業史家與社會大眾遂以此據點，向外攻城掠地，將史學知識當作思想工具，建

然，不應忽視的是，當代中國現狀確實是政治力量強大，社會領域極度萎縮的狀況。

構一種政治與文化論述，運用「滿洲性、中亞性」觀念來反省和批判「漢化」主軸的漢民族與大中國主義。劉氏的系列著述就是順著這股潮流，經由八旗文化引介入台灣。

劉氏以新清史的核心理論「內亞史」為基礎，結合其他史料與資源，再套用殖民關係，建構「窪地和秩序」的東亞世界觀，這是他從實然與應然層面否定中國歷史的認識論基礎。在他最著名的《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劉仲敬 2017a），將「中國－東亞」描寫成一個僅能接收技術輸入，雖統一卻相對封閉又內耗的「窪地」；進而將中國歷史經驗上的成就，都解釋成是接受自內亞的「秩序」輸出。「窪地」是一種海拔低於周圍地區，易積存卻不易排出的地形。劉氏用「窪地」概念描寫中國歷史發展，將統一形式的帝國評估為在技術上處於退化或停滯的狀態。而當王朝遭遇遊牧民族挑戰、攻擊乃至於崩潰，即是內亞區域向窪地輸入新式技術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往以漢族視角書寫的統一與分裂，其實是封閉與突破的契機；只是歷史的行動者和主體變成了來自內亞的遊牧民族，是這批人為「中國－東亞」帶來「秩序」。劉氏的「秩序」指涉了由權力頂端形構的管理、規範與制衡的技術和相關實踐（劉仲敬 2017a: 230-234）。於此，論著裡的「中國」概念，是在接收內亞資源而逐漸擴充，卻又因追求華夏文明為主體的目標而消弭了豐富的多元性。劉氏筆下的帝制中國，就是一個「秩序的窪地」，是一種以華夏文化為核心的「簡單化產物」，如同殖民地般接收內亞草原在歷史上幾次輸出的技術、資源與經驗，卻又在建立漢化帝國的過程中，消去了內亞組織及特徵，導致「中國窪地」最終只有走向裂解的結局（劉仲敬 2017a: 273, 2017b: 452）。

在「內亞－東亞」的世界觀基礎下，劉氏發展出一套非常特別的通史論述，構築了 5 卷冊的《逆轉的東亞史》。這裡要簡略討論這套特別的區域史著。該書系本意不在重寫中國史，而是重建他認知的，東亞和內亞互動的歷史過程。書系有兩個顯著特點，可與《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橫向時間軸稍做比較。第一，將資源、文化輸出

主體定位於內亞區塊，去除中原／中華中心論調。這讓劉氏劃出的討論區域分別是：東南（吳越與江淮），西南（巴蜀、滇與夜郎），華北（晉、燕、齊），上海，東北（滿洲）；並沒有我們既往熟悉的中原或中華這類核心區塊。第二，其區域論與各自獨立的民族歷史經驗結合在一起。不同於岩波書系強調中華「古典國制」向外擴張及與周邊民族、文化相遇及互動的線索，劉氏東亞史的歷史行動者就是原始居住在這些區域上的民族。他特別注重個別區域民族的歷史經驗，通過描寫其連續性，進而展現他們自外、特異於漢民族的特性（劉仲敬 2021a, b, c, d, e）。換言之，這幾個區域沒有被看作小寫的「中國」，他們的歷史也不是為了建構大寫「中國」而發展。這樣來看，《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展現了中國歷史經驗裡「一體性和多元性」互動競爭的張力，《逆轉的東亞史》則著重個別區域與內亞存有不同程度的關聯性並且獨立發展的歷史線索。也就是說，論著標舉的「非中國視角」，是將特定區域從「中國發展成形歷程」裡頭抽離出來，重新描繪個別區塊的歷史經驗，進而證成劉氏倡議應該走向分裂的中國史論。

與當代中國現象和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目的論式歷史敘述，是劉氏著史的特點。他仰仗內亞史論述，建構「中國－內亞」、「華夏－非漢」、「一元－多元」三種軸線的對比，並將歷史複線發展的特性，簡化為「輸入與輸出」、「漢化與內亞化」、「單一帝國文明與多元文明」，前者取代後者的單線式進程。劉氏筆下的內亞史與中國史，兩者之間彷彿存有無法相容的立場。這兩種書寫中國歷史的視野與取徑，必須相互競爭對於「中國」的詮釋權，而不是讓執筆轉換不同視角來觀察中國的多線發展；顯然有別於前揭三種通史論著的處理方式。應該說，劉氏將邊疆帶入歷史解釋的視野，不只是為了翻新中國史敘述，更是為了以邊緣裂解並取代中原。內亞史之於劉氏，就是這種工具性鮮明的政治論述。

整體來看，劉氏的論著雖然欠缺史料和現代史學研究基礎，但是極具政治渲染力；這使得他的觀點與主張在 2020 年前後的台灣社

會深受注目，形成一個特殊的知識現象。2016 至 2021 年間，八旗大量出版劉氏論著，觸及近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範疇，均在倡議一種「非中國」、「非統一帝國」視角的歷史書寫。部分讀者與政治行動者相信並支持這種歷史論述，甚至據以強化自身反對中國／中華政治、文化的主張，進而形成「顛覆大一統中國史觀」與台灣民族主義結合的狀況。這種結合極具吸引力，又有其危險性。歸根究柢，劉氏的主張——中華文化之於東亞與世界僅有負面效益——是沒有堅實材料為論據的。這樣一來，最銳利的矛可能隨時變成脆弱的阿基里斯踵。事實上，劉氏的「非中國視角」更接近英文語境裡“*anti-historical*”，是不顧歷史，刻意扭曲中國歷史的做法。讀者和政治行動者的追捧，其實反映了多數人對於「認識中國史」的立場和目標，是混合了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兩個層面。

杜正勝和劉仲敬展現了從學術介入現實問題，從歷史挑戰現實中國霸權的做法，帶有鮮明的解構意圖。劉氏從「非中國」視角考慮中國歷史進程、特質與內在缺陷；杜氏則從「中國」視角，甚至可說是原點的上古史出發，考慮統一帝國建構的過程和特質。兩人的觀點與立場，一內一外，相互對照，形成解構和重建中國歷史的兩種認識模式。不過，還應該注意的是，這段學術工程的發展也展現了歷史與現實之間不太良性的互動。當人們越是願意捧讀並相信劉仲敬混淆實然和應然的非史學論著，就越是彰顯台灣社會裡頭「中國」問題的複雜與困難程度。

五、新、舊知識秩序的初步比較

根據筆者現階段觀察，新、舊知識秩序的分野大概出現於 1990 至 2000 年前後，並自 2010 年後陸續出現新的史著，這段進程標誌了學術界與公共領域在中國史問題上形成的明顯轉變。舊的秩序是指台灣社會自黨國時代以來依循「中國／中華史觀」形成的中國史知識。現有研究指出，這個史觀在 1990 至 2000 年前後產生許多重要變化，

主要環繞著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問題展開，分成兩條軸線進行。先是自台灣史範疇著手，嘗試逐步剔除先驗式的中國經驗和元素，思考台灣史學界的歷史主體性問題；其後才是中國史學者對於自身研究取徑和觀念的省思（蕭阿勤 2012；彭明輝 2002；高明士 2004）。這段時間醞釀了台灣歷史學研究的諸多變化，反映了兩種相異的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方式及價值觀念的形成、互動乃至於競爭，亦即本節討論的新、舊知識秩序問題。此處就以講談社、岩波書店、哈佛、杜正勝、劉仲敬這四種挑戰「中國／中華史觀」的書籍，作為新知識秩序的代表史著做比較討論。

黨國時代形成的「中國／中華史觀」，在 2000 年以前具有廣泛影響力，塑造了社會大眾對於中國歷史的結構性認識。這個知識秩序深受國族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治理制度影響，絕大部分源自近代中國和台灣的中國史研究。舉例來說，錢穆《國史大綱》雖為特定時代的產物，但仍彰顯了民族國家建構和現代歷史書寫的緊密關聯。錢穆強調的國史和內在精神，具體反映在他筆下以漢族為中心，中國和域外相對立，悠長、統一且不間斷的歷史敘述中（錢穆 2023；孔令偉 2023）。這類型的中國史論連帶影響台灣歷史學界，且從學術圈延伸出去，建構在教育體系上，進而形成民間社會對於「中國」與中國歷史的廣泛認識、民間輿論、個人／群體經驗、大眾情懷和歷史記憶。其中，歷史教育可能發揮更深遠影響力。宋佩芬、陳俊傑曾指出，自 1950 年代起的國編本國中歷史教科書，中國史敘述主線就存有「黃帝建國一元論與道統路線、以朝代更迭為主軸、革命建國與反共復國」這三項特點，形成當時顯著的「國史」認知（宋佩芬、陳俊傑 2015: 10-14）。這種從學術界開始，進入教育體系再傳至民間社會的過程，並不是單線發展，更可能是往復影響的迴圈；特別是公共領域內環繞著「中國」、「中華」形成的輿論、情懷和記憶板塊很可能倒回來產生影響（王明珂 1997；王晴佳 2000, 2006；林滿紅 2002；杜正勝 2004；陳俊傑 2010）。各種相關爭議最常體現在歷史教育場域中。本文開頭舉的例子就顯示了，在 2010 至 2020 年間，這個舊有知

識秩序之於特定族群仍有顯著的解釋效力，部分人們仍相信這種歷史知識打造的「中國」。

新、舊知識秩序關於「中國／中華史觀」的建立和挑戰，是環繞著「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這個核心論題展開，並在探索這段歷史的過程中重塑關於「中國」概念所指的認識。這也成為本文比較的基準點，我將它分作三個部分：第一，描寫這段「形成史」的立場、角度以及可能援引的理論資源；第二，「形成史」的歷史結構；第三，對這段「形成史」的評估及其背後的特定目的。底下先概略說明舊的部分，再進一步細論新變化。

關於「中國是如何形成的」，舊的知識秩序會做下述描寫與評估。第一，以「中國／中原中心」為基本出發點，形成明顯的「核心—邊陲」分野性視角，觀察以漢文化為主體、漢人為主要歷史行動者的歷史發展與變遷。第二，以線性時間為歷史結構主軸，將中國史描寫成在線性時間序列上連續不斷的王朝傳統。並以較為扁平的空間視角，從同質性較高的單一區域，亦即漢人／漢文化核心區域來衡量中國全貌，但卻忽略不同區域互動造成結構變化和不均質現象的意義，也較不考慮疆域外部與中國的聯繫、互動和可能影響，或者僅從對立角度來考慮中國和域外世界。第三，多半注意一元式與連續性強的評估性特點，並從這種認知形成將「統一」當作歷史目的之「大一統帝國」認識論，進一步影響和塑造了中國史知識的再生產。整體來說，以「中國／中華史觀」為核心形成的舊知識秩序，對於「中國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可能會是：從「民族—國家」的後設立場展開對於「中國」的歷史性與非歷史性追溯，亦即以「中國中心」出發，認定「中國」是一個占據龐大地理空間的國家，時間長且連續性強；建立在相近族群、生活習慣、文化傳統基礎上，內部高度同質化，且在與域外他者接觸過程中，不斷吸收、同化異質區塊、人群和文化，形成一個占據部分亞洲陸塊的鉅型國家。這個龐大國家的歷史與台灣存有明顯連續性，台灣歷史、文化之目的和價值就是為了論證一個統一式中國而存在；這般論調成為主導人們認識並解釋自我和他者歷史經驗

的思想資源。

新知識秩序關於「中國是如何形成的」問題，會做如下描述與評估。第一，肯定「中國」並非不證自明的。循此立場出發，不再抱持「核心—邊陲」分野，而是改「邊陲」為「核心」，又可能是採「多核心」的角度，形成點狀分布、區域互動視角；觀察漢文化、漢人與非漢文化、族群等多元歷史行動者的歷史發展與變遷。論者從根本立場上否定了「自古以來的中國」、「中國亙古不變」這種拒絕學術論證，懷有鮮明政治主張、目的之預設。從自然環境、地理範疇、政治統一實體、行政制度、社會結構、族群、思想文化乃至於概念層次，「中國」不能在不經過長時段考索，或是在特定時空間下進行拆解，就當作先驗、本質式、理所當然的存在。將中國問題化和歷史化，是這段「形成史」的基本立場展現。

第二，歷史結構的部分，反省了以「王朝」為單位所預設的時間連續性，並結合域外史學視角及理論，重新考慮「中國作為一個空間」和「組成『中國』的複數空間」兩個課題。也就是說，拆解與分析「中國」的基礎單位要具彈性且多變。首先，我們很難從根本上否定時間連續性這個特質。至於如何劃定不同時間區段來描寫，以及審酌考慮「斷裂」的角色，這幾部書给出了一些想法與方向。我認為他們示範了一種類似西方史學的「漫長的十八世紀」（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的做法，可以在長時段脈絡下觀察幾種因素的漫長影響與現象生成，以總成歷史經驗和特質。講談社書系連結幾個王朝為一「長時段」，觀察朝代興替間的連續與非連續性，審酌考慮朝代的「斷裂」有無可能推動了「中國」整體歷史的連續發展。像是從三國以來的南北分離，既是統一王朝特質的斷裂，但也賦予新區域（南方）發展的機會與資源，繼而為日後南方社會承續。杜正勝則是用「政治—社會」結構建立三階段的歷史分期論，突破既有依循西方經驗的分期觀念，並發掘主導歷史結構轉變的政治性力量。

再者，對於空間單位的反省，可說是近年來中國史的焦點。這些書都注意到應該從地域與自然環境著手，在長時期歷史變化中考慮空

間如何影響人們的選擇與行動。以中國境內來說，我們現在會注意北方、南方，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在氣候與環境的差異；並從歷史行動者如何在限定條件下運用資源來解決困難這個面向展開研究。此外，受到內亞史、海洋史和全球史刺激，史家轉從域外民族、活動，從外部歷史經驗來考慮中國歷史。「中國作為一個空間」，明顯受到來自歐亞大陸、東部海域和南方海域的複雜影響。至於「組成『中國』的複數空間」，岩波書系將空間當作橫向時間軸的方法，幫助我們更細緻且有層次地，將中國這個龐大的時間量體分割成一個一個能顯現相互連結、影響且又有時間先後關聯的小區塊，重塑這片廣大土地的歷史樣貌。劉仲敬的做法走得更遠，將中國直接分割成幾個獨立空間，描寫那些土地上不同民族與內亞區域的互動，重構一幅「去中國」的東亞史。

第三，對於這段「形成史」的評估，主要揭櫫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多樣化與異質性特點，進而對「統一」產生更複雜的討論。相較於過去以「統一」為目的論的做法，現在我們並不把「統一」當作歷史必然的走向，而視為政治社會型態的選項之一。中國的歷史應該是「統一」與其他政治選擇競爭的過程，特別是從八世紀中葉到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出現之前，多國分立的狀態延續了很長的時間。此外，中國的「統一」是核心整合多元資源進入境內？或是核心被整合入不同資源叢聚的動態過程？這從兩種相反方向來描寫歷史的做法，反映的是「中國是逐漸擴張形成」還是「裂解以被整合入其他部分」這兩個問題。帶有明顯政治目標的論著，其解構史觀及論述其實也刺激我們嘗試結合非中國區域的視角，重新考慮「中國逐漸整合形成」的立論基礎。結合這些評估性意見，我們才能更仔細思考「統一」之於中國歷史的意義和價值，進而肯認在「中國」形成的歷史裡，一直存在「一元」與「多元」兩種傾向相互拉扯的線索。讓「中國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從應然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層面、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中剝離出來，從「中國」所指為何的問題開始，回到實然歷史場景，一步一步認識小寫、複數的「中國」與大寫、單數之「中國」的關聯。

六、結論

人們總是在特定情境中運用知識，知識也只能在限定條件下形成有限的解釋。顯然，知識並非放諸四海皆準，超越時空。故爾，從事知識史研究者主張將知識「歷史化」，視其為特定時空脈絡的言說與主張，是一種歷史性行動而非永恆真理。研究者循知識發展和運作的線索，即能觀察歷史行動者和社會結構，以及兩者的交織互動，進而形成對於特定歷史現象的分析（Lässig 2016; Jordheim and Shaw 2020）。在此基礎上，本文以「知識秩序」概念為研究視角，討論幾種書籍帶來了何種認識中國史的內容與模式，並將其與不同時空的中國史知識做初步比較。希望這個階段的發現能作為未來從「知識效力、權威—時空環境」關聯之角度考察「當代台灣中國史認識」問題的基礎。

知識之所以被人們信任並肯定其解釋效力，是思想與非思想因素的交織互動；是特定時空內部各種交織的力量，讓某種知識成為我們面對世界的資源與工具。2010年以降，台灣社會在政治與文化範疇上極力想劃清與中國的界線，同時，這股力量也為我們推開了重新認識「中國」的窗口。當我們將上述新、舊知識秩序比較所得之論點放入2010年後的台灣社會就可以發現，「中國」逐漸問題化的腳步與台灣認同意識形成的過程，若合符節。過去研究都會注意到，1990年至2000年前後是台灣主體意識形成的關鍵點，在政治、社會、學術與文化面向皆然。本文更進一步指出，與這段進程近乎同時且持續發展的線索，就是「中國」逐步問題化的過程。現代史學發展與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本就十分緊密。本文從「當代台灣社會的中國史認識」這個問題切入觀察，我認為這座新知識秩序說明了，和重建台灣歷史主體同樣重要的是，建立能合理描述和評估中國歷史經驗的立場與方法；這個知識發展的階段也正為台灣國族建構的關鍵時期。

可以肯定的是，這座新知識秩序正逐漸在台灣社會建立關於中國

歷史解釋的優勢。文章討論這幾種挑戰「中國／中華史觀」的書籍，整體反映了台灣社會在理解中國各類問題上逐漸形成一種淡化「中國中心論」視角的趨勢，但又不能單純以超越／反對／非中國史視角來概括說明。這種詮釋方法，部分或全盤跳脫傳統中國歷史書寫所設定的條件、元素甚或本質，批判性建構得以描寫與評估中國史的全類角度和方法。其所催生的作品組成複雜的光譜，有些走得很極端，太與現實因素緊密結合；有些則是在視角、理論、材料上求取部分突破；本文討論的兩類書籍正好說明這個特色。整體來看，學術界產出了部分成果，社會大眾也亟於透過商業出版來了解中國。於是，這類觀點和解釋趨勢在公眾領域裡逐漸流行開來；只要能幫助讀者將觀看中國的視角從「中原」、「中國中心」移開的作品，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

歷史知識和意識是分層次地建立，常民世界的歷史觀念與學術界不一定完全重合，彼此形成的主要原因和動力也各有差異。多數讀者不一定能明白全球史、環境史、海洋史、內亞史、新清史的理论與相關論辯，但他們彷彿能從這類歷史論述中尋得突破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資源；特別在 2010 年以後，兩岸衝突日漸升高，以及台灣主體意識增強和凝聚的趨勢中，人們對這類資源的需求或許就成為推動商業出版的知識動力。然而，特定知識若是被抬升為應然的價值，即可能扭曲了知識生產的本意。我們必須警醒，即便再細緻的史學研究成果，若最終僅被扁平化為裂解「中國」縫隙的資源，那麼台灣的中國史知識秩序亦可能像另一台失速列車般，為了掙脫既有的知識殖民而走向另一個極端，陷入“anti-history”的困境——不再立基於知識的立場，淪為單純的「反中國」論述。

誌謝：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會的指正。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解殖、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工作坊（2024 年 7 月），會議上獲得魏龍達博士、湯志傑教授與葉高華教授的指正意見。筆者十分感謝。此外，我也要感謝助理黃佩雯同學，在我搜集資料、撰寫和修改文章的過程中，給予許多有益且及時的協助。

參考文獻

-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 2013 ,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廖彥博譯, 2020 , 《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麥田。
- , 2016 , 〈中文版總序〉。頁 15-17 , 收入陸威儀 (Mark Edward Lewis) , 《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 王興亮譯。中信。
- 上田信, 2005 , 《海と帝国：明清時代》。講談社。葉韋利譯, 2017 , 《明清時代：海與帝國》。台灣商務。
- 丸橋充拓, 2020 , 《江南の發展：南宋まで》。岩波書店。林琪禎譯, 2021 , 《江南的發展》。聯經。
- 千葉敏之編, 2023 , 《1348 年 氣候不順と生存危機》。山川出版社。陳嫻若譯, 2024 , 《1348 年：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台灣商務。
- 天兒慧, 2004 , 《巨龍の胎動：毛沢東 vs. 鄧小平》。講談社。廖怡錚譯, 2016 , 《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商務。
- 孔令偉, 2023 , 〈情的融合？——《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頁 176-213 , 收入王汎森等合著, 《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台灣商務。
- 木村靖二編, 2022 , 《1919 年 現代への模索》。山川出版社。黃鈺晴譯, 2023 , 《1919 年：邁向現代的模索》。台灣商務。
- 王明珂, 1997 , 〈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 149-182。
- 王晴佳, 2000 , 《台灣史學 50 年：傳承、方法、趨向, 1950-2000》。麥田。
- , 2006 , 〈解構與重構——近二十年來臺灣歷史意識變化的主要趨勢〉。《漢學研究通訊》25(4): 13-32。
- 古松崇志, 2020 , 《草原の制覇：大モンゴルまで》。岩波書店。黃耀進譯, 2021 , 《草原的稱霸》。聯經。
- 平勢隆郎, 2005 , 《都市国家から中華へ：殷周春秋戦国》。講談社。李彥樺譯, 2018 ,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商與春秋戰國時代》。台灣商務。
- 伊原弘, 2006 , 〈書評：講談社版『中国の歴史』シリーズ〉。《中国：社会と文化》21: 265-279。
- 吳俊瑩、吳密察、李筱峰、周婉嫻、金仕起、祝平一、陳翠蓮、黃維勻、蔡蔚群、薛化元, 2015 , 《我們為什麼反對「課綱微調」》。玉山社。
- 宋佩芬、陳俊傑, 2015 , 〈國中教科書之中國史敘述變動 (1952-2008) 〉。

- 《教科書研究》8(1): 1-31。
- 尾形勇，2017，〈面對著大自然：環境、開發、人口的中國史〉。頁 8-66，收入陳柏傑譯，《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台灣商務。
- 杉山正明，2005，《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講談社。郭清華譯，2017，《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台灣商務。
- 杜正勝，2004，《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三民書局。
- ，2022，〈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古今論衡》39: 4-60。
- ，2023，《中國是怎麼形成的》。聯經。
- 汪暉，2020，《世紀的誕生》。三聯書店。
- 汪榮祖編，2014，《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遠流。
- 岡本隆司，2020，《「中国」の形成：現代への展望》。岩波書店。郭凡嘉譯，2021，《中國的形成》。聯經。
- 林滿紅，2002，《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麥田。
- 金文京，2005，《三国志の世界：後漢 三国時代》。講談社。林美琪譯，2018，《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台灣商務。
- 宮本一夫，2005，《神話から歴史へ：神話時代 夏王朝》。講談社。郭清華譯，2018，《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台灣商務。
- 徐泓，2016，〈「新清史」論争：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8: 1-13。
- 高明士編，2004，《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八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陳俊傑，2010，〈戰後臺灣國民教育社會科教科書與國家形塑（1952-1987）〉。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彭明輝，2002，《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麥田。
- 渡邊信一郎，2019，《中華の成立：唐代まで》。岩波書店。詹慕如譯，2021，《中華的成立》。聯經。
- 渡邊信一郎、丸橋充拓、古松崇志、檀上寛、岡本隆司，2021，〈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頁 5-7，收入詹慕如譯，《中華的成立》。聯經。
- 菊池秀明，2005，《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清末 中華民国》。講談社。廖怡錚譯，2017，《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台灣商務。
- 黃春木，2021，〈從高中「中國史」課綱修訂爭議反思歷史課綱修訂與展望〉。《清華教育學報》38(1): 73-105。

- 黃興濤，2017，《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楊照，2021，《不一樣的中國史》十三冊。遠流。
- 葛兆光，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聯經。
- ，2016，〈推薦序〉。頁 1-14，收入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王興亮譯。中信。
- 劉文鵬編，2010，《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劉仲敬，2017a，《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八旗。
- ，2017b，《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八旗。
- ，2021a，《逆轉的東亞史：非中國視角的東南（吳越與江淮篇）》。八旗
- ，2021b，《逆轉的東亞史：非中國視角的西南（巴蜀、滇與夜郎篇）》。八旗。
- ，2021c，《逆轉的東亞史：非中國視角的華北（晉、燕、齊篇）》。八旗。
- ，2021d，《逆轉的東亞史：非中國視角的上海（上海自由市篇）》。八旗。
- ，2021e，《逆轉的東亞史：非中國視角的東北（滿洲國篇）》。八旗。
- ，2022，《窪地與韭菜：阿姨論中國（人）的心理、現實與結局》。八旗。
- 歐立德，2014，〈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1: 29-40。
-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聯經。
- 錢穆，2023，《國史大綱》上冊，修訂五版。台灣商務。
- 藍弘岳，2022，〈「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93(1): 213-272。
- 羅威廉（William T. Rowe），2012，《*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李仁淵、張遠譚，2016，《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鶴間和幸，2004，《ファーストエンペラーの遺産：秦漢帝国》。講談社。李彥樺譯，2018，《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台灣商務。
- ，2005，〈中國文明論：多樣性與多元性〉。頁 67-125，收入陳柏傑譯，《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台灣商務。
- Burke, Peter. 2016.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olity Press.
- Clunas, Craig. 2012. "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 African Studies* 74(1): 161-162.
- Darnton, Robert. 1979.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Belknap Press.
- . 1995.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W. W. Norton.
- Ghosh, Durba. 2012.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3): 772-793.
- Hunt, Lynn. 2018. *History: Why It Matters*. Polity Press.
- Jordheim, Helge and David Gary Shaw. 2020.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3-18.
- Lässig, Simone. 2016.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59: 29-58.
- Sewell, William Jr. 2005.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Pp. 225-270 in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sh, John. 2008. *Why History Matters*. Palgrave Macmillan.
- Wang, Wensheng. 2012.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by TIMOTHY BROOK,”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3(1), SPECIAL ISSUE: GLOBAL CHINA: 170-174.